

受的；一个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入被石棉污染的船只是不可接受的…是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职业环境健康中心（印度）领导人Joshi博士强调，禁止石棉运动日益壮大的网络联系是2006年12月3日在新德里召开的会议议程。这次出席良好的会议，以亚洲的重要科学家和医学家，北美、中东和代表亚洲石棉受害者的运动家，以及社区组织的展示为特色。在2007年5月18-19日，一次韩一日石棉问题解决办法座谈会，在韩国首尔召开；这次活动被两国众多代表公民社会的群体支持。

自从她的丈夫死于石棉相关的肺癌后（2001），Kazuko Furukawa太太，以她代表受害者进行的不辞劳苦的运动，而在日本家喻户晓。她现在明白了医生最初告知他们的诊断结果。在那之前，他们俩每人听说过石棉和石棉与癌症的关系。Furukawa女士说：“自从我丈夫死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奔波于整个日本，帮助其他石棉受害者。

我的丈夫是在一个电站里暴露于石棉的，他在那里作焊工…自从他死后，我一直在和石棉作斗争。刚开始，我是只身一人在抗争。我开始了申请工人意外事故赔偿金（WACI），但是很长时间后才得到申请批准。我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我申请WACI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了，他一直在这么一个危险和极其糟糕的环境下工作。在工作场所，他们没有得到安全指示，并且也没有提供给检查系统和个人保护设备。”

和其他石棉受害者共同努力，Furukawa女士是日本间皮瘤和石棉相关疾病受害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保护组织（伞组）确保当地石棉受害者



### 案例分析

### 亞洲石棉受害者 動員

组织和运动NGO组织，在国家石棉辩论会上出席。这个协会创建于2004年2月7日，以普及石棉相关疾病的意识，以及在石棉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中提供信息交流，以便和石棉诊断结果带来的沮丧、孤单、孤立抗争。

协会成员的经历都大不相同；有的是不同程度的残疾了很多年，其他的在诊断6个月内死去。医药治疗包括：手术，化学疗法，药物，民间疗法和缓和法。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在走向更年轻，其中有的是30多岁，有的是40多岁；尽管多数石棉接触史职业性的，但是有很多案例是非职业性的和环境接触。

接下来的这些案例，阐明了在日本司空见惯的一例例个人石棉悲剧。在他死之前的2004年9月，65岁的Tokuo Kato写到：

“从我开始承受恶性胸膜间皮瘤病痛，已经两年过去了。在病情发展的同时，我在多方面变得悲痛。刚开始，我是困惑的，后来当医生告诉我无法治疗时，我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我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那种感受就像你已经摔倒了，又被人踢一样。

大概40年前，我在一家锅炉制造公司作焊工。我的病因就是那些年的石棉接触。不是我自己的错而得的这个病。我对我必须死于这个无望治愈的病，而感到难过。在我被诊断出之前，我没有间皮瘤方面的任何信息。有一天，在我看电视时，得知了有一条“石棉热线”。我打入了电话，得知了可以申请工人赔偿。半年后，多亏了这条热线工作人员的帮忙，我得到了工作赔偿。那封告知信很简单，但是给了极大的慰藉。

直到随后，给我用了抗癌药物，我不断反复去医院。我真的感到在我的身体里，我的情况变得一天比一天坏，想要尽快得到有效的药品。作为一位病人，这是自然的渴望。在过去，我们不知道石棉的危险，吸入了它。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石棉是致癌物质。不要再有像我这样的受害者了。这是我的另一个愿望。”



从1970年代开始,协会报告员Fumitoshi Saito,曾经在房顶、商店和工厂这样的地方做电工;他使用过几种不同的石棉板,既没有被告知有害,也没有被给与保护设备。Saito(69)先生在1998年被诊断为肺癌,做手术取了右边的一部分肺;在取出部分发现了石棉纤维。现在,他咳嗽,当气温或湿度改变时,他感到呼吸困难,伤口周围疼痛。在2002年一位医生和护士的探访之后,他才知道他的情况可能是石棉接触所致。有东京职业安全与健康中心的帮助,他成功地获得了工人赔偿金。Saito先生,对协会给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创造了机会,分担了他们的困难和癌症痛苦,而感到骄傲。“我曾对石棉一无所知”,他说“现在我尽量告知全国的石棉受害者有关石棉的信息,尤其是诊断,治疗,照顾家人和赔偿。”

1998年3月26日,他死于石棉,粉碎了他的遗孀Kaeko Omori太太一生的梦想和愿望。在属于东京电力公司的电站工作了18年,使Kunio Omori接触了大量的石棉材料。对他的状况最初诊断是肺癌;这是Omori太太说的,已经够糟糕了,但是第二个更坏的是:恶性间皮瘤。这家公司最初拒绝了Omori太太的赔偿要求,后来因东京职业安全与健康中心的加入,而变温和。对于将Omori先生暴露于杀死他的石棉,这家公司不道歉,Omori太太感到很难接受。她说:

“我的丈夫和我已经计划了,在他退休之后,我们环游日本,但是我们的梦想是不会实现了。我不认为我的丈夫是自然死亡。他是被公司和政府杀害了。”

当Saito先生家认识到,他再也不能从使他住院的疾病中康复过来时,他们把他接回了家。当他的病情恶化时,需要更多的止痛药控制疼痛。当疼痛最后消退时,Saito小姐和她的妹妹/姐姐,让她们的父母给她们讲



他们是这么认识的：“你们都去什么地方约会？当我们出生时你们是什么感受？”Saito小姐问到。

“当我的姐姐/妹妹感谢我父亲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时，我父亲笑得很开心。我们非常开心地回想过去快乐生活。”

“我们不能接受石棉的使用，从我们中偷走了我父亲，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活动，使之不再有像我父亲这样的石棉受害者。我父亲和我们家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进行的奋斗，才刚刚开始。”

协会秘书Rinzo Uno，在东京南部50千米，横须贺的一个镇，造了37年船。这期间的大多数时间，他需要用手移动石棉；直到1978年才提供获面具。他已经参与提高肺尘病意识的活动20年了，他是新日本石棉受害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15年前，他被诊断为肺尘病；他描述了肺尘病对他的生活的影响，如下：

“我经常是每晚咳嗽四阵。因为每次咳嗽都隔得很近，我不能摄取到药物。我的妻子帮我揉搓我的背部，有时她问我是否叫救护车，但我在咳嗽中而回答不了她。在我2个小时的发作中，她一直看着我，我感到生不如死。其实，不单单是疼痛，而是我的家庭的挣扎。当我在火车上有轻微的咳嗽发作时，我的邻座们有时会换座位。这让我感到很孤独。”

Uno先生谴责日本政府的被动：“我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死于间皮瘤和肺癌。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急迫性是我也在我的肺里带来一个定时炸弹。”

Kazumi Yoshizaki同意，在提高日本石棉意识中，协会得起重要作用；她的死于间皮瘤的父亲，曾在日本，王子，霓佳斯公司工厂工作。自从1896年，在日本，这家公司以生产隔热材料而闻名。不幸的是，他们的公司产品使用了石棉，很多以前的雇员，如Tadashi Yoshizaki，为公司的疏忽而用这样危险的物质而付出了代价。说起2006年7月，Yoshizaki小姐告诉石棉会议上的代表，她爱她的父亲，憎恨石棉，发誓Yoshizaki家将继续为全球石棉禁令和所有石棉受害者的公正而运动。

现在这个协会在整个日本已经有了10个分会，有接近400名成员。协会代表协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通过提供：

- 免费电话咨询服务；
- 帮助职业和非职业石棉接触病人提出赔偿要求；
- 为受害者，家庭成员和死亡者家属提供机会走到一起，相互支持和提供建议；
- 协调国内为提高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的苦境的法规游说。

这个协会举行社交活动，如在樱花节的野炊，以至于那些被疾病边缘化了的人们重新获得社交。2004年11月，协会在全球石棉大会（GAC2004）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会给日本人民，海外专家，受害者代表，受害者和死亡者家属提供了很好的，面对面的交流机会。从那之后，协会已经发出了，为石棉受害者提供基本权益和创造一个无石棉社会的请愿书，赢得了广泛支持。为了使这份文件吸引更多的注意，协会在东京举行了会议和集会。

为将窘境转变成有利的拥护团体，日本间皮瘤和石棉相关疾病协会会员们，将他们的痛苦经历变为力量，帮助那些生命正在受石棉摧毁的人们。他们倾听石棉相关疾病给那些人们带来的害怕和悲伤，帮助他们减轻孤单和孤立。仅仅在国际石棉受害者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召开后的很短时间里，他们已经使政府着手于，阻止日本不明智使用石棉这一漫长过程。

